

殊途同归——论《边城》与《围城》的精神旨向^①

雷文彪

(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编辑部, 广西 柳州 545004)

摘 要:比较《边城》和《围城》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尽管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两部作品的最终精神旨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都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关键词:《边城》;《围城》;沈从文;钱钟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4-0100-04

“Different Roads Lead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on the Spiritual Direction of *The Border Town* and *Fortress Besieged*

LEI Wenbiao

(Editorial Office of Liuzhou Teachers College, Liuzhou, Guangxi 545004,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order town*and *Fortress Besieged*, we may discover that though these two works hav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literature expression and reality attention angle, they have the common cultural standpoint. The final spiritual direction of both works reflects a deep concern of moder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human nature pursue, personal dignity, and has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humanities concern.
Key words: *The Border Town*; *Fortress Besieged*; Sheng Congwen; Qian zhongshu

《边城》和《围城》分别是沈从文和钱钟书的代表作。尽管两部作品所呈现出的人文景观、爱情观念、生命意识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它们在本质上有着共同之处,即两部作品的最终精神指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都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一、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边城》和《围城》都产生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当时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面对这样一个黑暗、混沌的社会现实,沈从文以“乡下人”的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

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有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1]沈从文通过湘西这个边远山城的“净土”,用理想化的笔墨寄寓自己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关注。《边城》表现了湘西豪迈、朴实、健康、优美人性的内在意蕴,彰显人类那种“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以此反照现代社会在“现代文明”遮掩下的人性堕落和丑陋,寄寓了沈从文建构美好人生社会的理想。此外《边城》的结尾是一个朦胧回答,引人回昧。从表面上看,这种悬念寄予了对翠翠的同情、

^① 收稿日期: 2010-05-17
作者简介: 雷文彪(1979-),男,湖南永州人,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编辑,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关怀,实际上,作者借此引发我们去思考当时混沌社会撕裂人们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的痛苦。

《围城》是钱钟书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感时伤世之作。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描述了当时自身内外交困的境遇:“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这里表面上是描绘钱钟书自身穷困潦倒内心愁闷的处境,但实际上是在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围城”困境,所谓的“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只是一个托词而已。钱钟书的“销愁舒愤”实际上是想凭借《围城》的艺术创作来抒发自己对现实混沌世界忧愁和对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人性的愤慨。面对围城社会,钱钟书并没有像梁启超热情洋溢地呼唤和赞美“少年中国”,也没有像鲁迅那样悲愤地呼喊“救救孩子”,更没有像郭沫若、巴金等作家那样热情喷发、激流勇进地呼唤和歌颂新时代的到来,而是以一种超然的理智的心态和“解构书写”的方式,对“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价值混乱,予以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作者一方面注重环境围城的构筑,另一方面又注重人生围城的营建。小说呈现的生活环境主要是极具现代文明色彩的中国上海和三闾大学知识分子圈,在这里一大群被誉为现代社会精英的教授、博士、学者们不学无术却随处高谈阔论,满嘴的西方经纶实际上却是一无是处,满嘴的仁义道德却干着娼妓不如的勾当,还振振有辞地宣称作为文明人的作为。“钱钟书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讽刺挖苦,表明他对民族传统文化能否继承和流传下去的担忧和焦虑。现代性的焦虑与民族文化失重这两种冲突都集中在‘围城’中,通过这种围城状态来反映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和错杂交汇的现实语境。”^[2]在这里钱钟书以现代“都市人”视角来直接描绘现代“文明社会”造成的人性缺失与腐化的现实,他用现实的笔触从反面来讽刺现实社会,希望人们能摆脱这种生存环境,跳出这样的“围城”世界,体现了作家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围城》中对现有的一切,钱钟书虽多有否定和怀疑,但整部作品中丝毫找不出如沈从文作品中那种因现代文明对人性的破坏和侵袭而要求摈弃文明,返归自然的倾向。与主人公在人生旅程中虽屡遭失败,但却并没有对他处身的文

明持一概排斥的态度一样,钱钟书虽然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病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人生的困境,但并不因此而主张完全抛弃文明而回归原始,相反地他声明自己‘是相信进步的人’,这是钱钟书这位智者对人类的一种乐观的希望。”^[3]

二、凸现现代人的人性追求

尽管《边城》和《围城》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切入视角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两部作品关注现代人人性追求的文化立场却是一致的。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会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注意不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4]⁴⁵《边城》中对现代人人性追求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义。边城中的人们都轻利重义、守信自约。翠翠的母亲同茶峒屯防军人的爱情之义,天保、傩送兄弟的对手足之义,妓女的“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都让人感受到义之神圣与伟大。二是爱。《边城》里的“爱”主要表现为东方形态的人与人之间近于伦理意识的情感慰藉。沈从文说:“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4]²⁵⁴主人公翠翠是“爱”的化身。她温柔恬静、天真善良,在情窦初开之后就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情人。作品中的天保豁达大度、杨马兵热诚质朴等都是爱的体现。三是美。《边城》中的美可谓随处可见,小说描绘了美不胜收的人文景观:茶峒依山傍水,山清水秀;主人翁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人不发愁,从不动气”。小说中描绘的其他人物都是善良、淳朴、憨厚。总之,《边城》中所描绘的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会悖于人性的人生形态都是美的表征。毋庸讳言,沈从文的《边城》旨在创造一种德治乌托邦。他创作《边城》的宗旨就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营造”,^[5]他说:“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令人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将在各个作品各个形式里,表现我对这个道德的努力。”^[6]沈从文以其自身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人性中所具有的“义、爱、美”的内在品格,并以此营造一座“希腊神庙”来

探求人性的存在形式,借以供奉人性,引人向上,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人的人性追求和深切关怀。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小说表现湘西健康、优美人性的深邃底蕴,并以此来展示他为人类描绘的那幅‘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反照现代社会在‘现代文明’遮掩下的人性堕落和丑陋,以及生命力的日趋萎缩,寄寓了沈从文建构美好人生社会的理想。”^[7]

钱钟书曾在《中国文学》一文中说到:“中国讽刺作家只徘徊在表层,从未深入探索人性的根本颓败。”^[8]^[32]于是他摒弃中国传统讽刺作家“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索,对文化人格作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8]^[33]在《围城》中,钱钟书并没有像《边城》那样通过营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来供奉人性,而是从现实出发,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审视“围城”人生,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艺术地制造幽默和讽刺,将围城混沌大世界中众多人物之间的世俗人生、人性、爱情、婚姻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挖掘人性深处的劣根性。作为理性关照下的钱钟书,在面对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杂糅与冲突,他内心有一种“忧世伤生”“惶急的情绪”,^[8]借方鸿渐的人生遭遇来抒发自己内在的矛盾心理。钱先生通过《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寄予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作家对人性深处诸多劣根性的挖掘,显示出现代文明的缺憾和现代人生的危机,在作品中不管是对人的自私自利还是游戏人生等方面的挖掘,都隐含着他内心对现代真实人性追求的关注。如他用消解形式来写传统理想爱情观念,蕴含的是他对另一种理想爱情观的尊重,希望人与人之间能相互沟通、了解;写方鸿渐以游戏形式恋爱,深层含意却是希望方鸿渐能真正爱一个人,将爱情进行到底。这种以彰显“丑”的形式来探寻“美”的意蕴,正是钱钟书的一种文化书写策略,是其“供奉人性”的独特形式。钱钟书借“围城意象”“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刻的解剖、批判和讽刺,正是这样更有利于人性的灰色黑暗、丑陋的描写,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存状态、生存境遇,更有利于表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人道关怀”。^[10]

三、彰显现代人的尊严

一直以来,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都以对理想人格和人格尊严的塑造和维护为精神指向。《边城》和《围城》都具有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意识,它们从

不同视角演绎了共同的文化立场,即以一种积极入世的心态来塑造和维护现代人的尊严。

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可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在《边城》中供奉的人性其实质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人格尊严的礼赞,主要表现在:

1. 对人类自然性爱的高扬和礼赞。所谓自然性爱是指建立在纯自然基础之上的出于人类本能欲望的一种自然纯真之爱。沈从文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他注重的是一种自然道德形式。尽管《边城》中诗情画意般的自然环境描写得令人心旷神怡,但这诗情画意审美意境不只是来自美丽的青山绿水,更主要的是来自边疆僻地那小山城的淳厚民风。在这里,翠翠是那样的淳朴、纯洁,犹如深山流出的一线清泉。她的自然性爱萌动的爱情发展史:青春觉醒、爱的萌动、爱的幻想、爱的追求、爱的执着与忠贞是那样层次井然。作者以内心无比的热情来肯定和礼赞这种爱情的自由发展,似乎在告诉人们:这就是真正的爱情!

2. 对人性善良品德的追求与讴歌。沈从文认为“美是一种形式”,而善是人性美的直接体现。“善”在这里不是作为功利的概念而存在,而是指一种美好的品德。善良品德是沈从文在伦理道德关照下的人性原则之一。沈从文与同时代的作家一样,面对罪恶虚伪的现代“文明工业社会”,都呼吁诚爱、善良品德的复归。鲁迅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在《边城》中沈从文从侧面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如果说祖孙之爱、父子之爱还只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彼此心心相通的话,那么边城人民彼此诚爱则标示出这种诚爱的共同性和更广阔的社会性了。

3. 肯定人作为“人”的存在。沈从文在他构筑的伦理世界里肯定自然的性爱和善良诚爱的品德,同时也强调人的尊严,肯定人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在《边城》中的“爷爷”为边城作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因而得到了边城人的普遍尊重与爱戴,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很好的实现。顺顺父子三人在边城人心目中具有显著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船队和物产,而是因为他们的勇气与义气、那种以助人为己任的侠义心肠。这充分显示出沈从文所营造的伦理世界对人格尊严的认同与肯定。这

里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以其“乡下人”的坚守与执着是基于自己特殊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他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则表现为对底层劳苦大众的人性和主体性的肯定,尤其显示了以老船夫和翠翠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底层劳动人民的尊严。总之,在沈从文的伦理世界里,人的自然性爱、人性善良的品质、人格尊严在沈从文所营造的人性世界里和谐统一,自然天成。

《围城》的思想批判指向和审美观照方向是整个人类存在,而作为人类存在本性的重要表征——人格尊严,更是钱钟书创作《围城》的主要的精神向度。《围城》对现代人格尊严的关注是通过“反面人物”的批判来彰显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他们或逢场作戏或真心相悦都缺乏真正的人格尊严。方鸿渐与鲍小姐的性解放是寻求一时快乐,无人予以理解;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拉锯戏”、方鸿渐与唐晓芙的真心相悦、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围城”等都没有对爱情负责,缺少相互尊重。他们很少面对面地谈心,也禁不起外界的一点“挤压”,使得人格尊严在无形中远离了自己。三闾大学的校长、主任、博士、教授、讲师等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同样道貌岸然、明争暗斗、相互排挤,虚假得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钱钟书以《围城》直面惨淡的社会现实,通过对乱世中的知识分子自嘲自卑和宿命论的人生态度的精辟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凄凉。他对现实的观照拥有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审视意味,他的思考已经延伸到对人的自身存在的形而上的人格尊严的探究,并且把这些思考和探究在作品中形象而自然地加以了表现。尽管作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摆脱人生困境的办法,但作品却足以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思索,让人们摒弃那些荒唐、虚伪、自私及一切人性弱点,寻回被世俗遮蔽或遗失的人格尊严。正如钱钟书在《围城》序文中所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性。”^[11]

詹明信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处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的文学艺术与西方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

自身“民族寓言”的表征,他认为:“所有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相同之处和它们与第一世界类似的文化形式的十分不同之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些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2]沈从文的《边城》和钱钟书的《围城》都具有一种“民族寓言”的文化品质,尽管两部作品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立场,都孕育了作者对当时中国现实境遇的深刻体察,它们的最终精神指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意识。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3:33.
- [2] 高宏存. “破家立国”的现代追寻——由鲁迅、老舍、钱钟书说起[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8(5).
- [3] 谢晓霞. 理性的坚守者——论《围城》的理性品格[J]. 云梦学刊, 2007(4).
- [4]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11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3.
- [5] 沈从文. 长河·题记[N]. 重庆《大公报·战线》第91期, 1943-04-21.
- [6] 沈从文. 萧乾小说集·题记[N]. 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28期, 1934-12-15.
- [7] 邢建勇. 沈从文小说的生命原始精神[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
- [8] 舒建华. 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J]. 文学评论, 1997(6).
- [9] 杨 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340.
- [10] 张新民. 浅谈“围城”的多义性[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4).
- [11] 钱钟书. 围城[M]. 鹭江出版社, 2002:3.
- [12]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张旭东, 编. 上海:三联书店, 2003:522-523.

责任编辑:卫 华